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3.02.003

我国双向投资的发展阶段及对策

李 辉¹, 邢智毅², 刘小岷³

(1.东北财经大学 津桥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2.大连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3.东北财经大学 津桥商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和知识等企业经营资源,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市场容量。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增强和国家区位优势的改变最终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运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实证检验得出目前我国双向投资已经进入第三发展阶段的结论。为此,我国应从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增强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家区位优势,促进双向投资协调发展。

关键词:双向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3)02-0015-06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资本的跨国流动,而跨国流动需要通过双向投资,即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来加以表现。只有通过双向投资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合理地配置两方面的要素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双向投资迅速发展,在全球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已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和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投资母国之一,2010年跃居世界第五位(见表1)。双向投资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贸易结构优化以及经济的发展。本文归纳了经济发展与双向投资关系的理论,并以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为依据检验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双向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最后从微观和宏观上提出了完善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西方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

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是从企业或行业等微观或中观角度出发,阐述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时机,但都没有深入探讨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而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详细阐述的有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竞争发展阶段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这些理论为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需要进行双向投资、如何进行双向投资以及双向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阐述。

(一)经济发展与双向投资关系的理论

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国际投资在不同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该理论研究了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一国的IFDI、OFDI以及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NOI)之间的关系。^[1]邓宁按照人均GNP的不同水平把有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NP小于400美元时,IFDI极少,基本没有OFDI,NOI为零或是近似于零的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NP处于400~2000美

收稿日期:2013-02-10

作者简介:李辉(1975-),女,满族,辽宁抚顺人,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研究;邢智毅(1972-),男,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网络安全研究。

表1 1982~2010年中国IFDI和OFDI情况及在全球地位(单位:亿美元)

年份	IFDI 流量				OFDI 流量			
	全球	发展中国家	中国	全球排名	全球	发展中国家	中国	全球排名
1982	580.59	263.77	4.30	19	274.42	26.4	0.44	31
1983	502.68	175.69	9.16	16	373.94	20.21	0.93	27
1984	568.39	176.1	14.19	8	501.47	24.01	1.34	20
1985	558.66	141.88	19.56	7	620.14	39.62	6.29	14
1986	863.78	157.78	22.44	10	967.99	51.25	4.50	19
1987	1366.41	217.91	23.14	13	1420.16	67.23	6.45	19
1988	1640.23	304.21	31.94	12	1824.52	120.33	8.50	18
1989	1972.76	307.3	33.93	10	2340.59	197.62	7.80	25
1990	2074.55	348.53	34.87	12	2414.98	119.14	8.30	22
1991	1540.73	398.34	43.66	11	1980.41	134.77	9.13	22
1992	1658.81	530.76	110.08	6	2026.35	231.56	40.00	11
1993	2233.16	767.39	275.15	2	2425.54	393.19	44.00	13
1994	2560.00	1033.8	337.67	2	2868.88	475.29	20.00	22
1995	3423.91	1158.01	375.21	2	3627.46	552.28	20.00	23
1996	3885.55	1466.49	417.26	2	3965.24	641.61	21.14	23
1997	4863.89	1906.5	452.57	2	4761.60	738.7	25.62	26
1998	7075.84	1907.31	454.63	3	6883.10	489.05	26.34	25
1999	10895.97	2288.76	403.19	8	10881.98	669.92	17.74	28
2000	14026.80	2576.25	407.15	9	12321.17	1341.94	9.16	33
2001	8261.77	2156.23	468.78	6	7526.60	825.43	68.85	20
2002	6268.74	1748.76	527.43	3	5371.83	497.4	25.18	25
2003	5727.90	1835.9	535.05	1	5737.92	460.27	28.55	25
2004	7423.86	2931.24	606.30	2	9301.05	1213.53	54.98	24
2005	9825.93	3323.07	724.06	4	8821.32	1221.43	122.61	18
2006	14618.63	4294.59	727.15	3	14053.89	2266.83	211.60	18
2007	19709.40	5730.32	835.21	7	21748.03	2941.77	224.69	19
2008	17441.01	6580.02	1083.12	3	19105.09	3088.91	521.50	13
2009	11850.30	5105.78	950.00	2	11705.27	2707.5	565.30	6
2010	12436.71	5735.68	1057.35	2	13233.37	3275.64	680.00	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网站(<http://www.unctad.org/>)。

元之间,IFDI开始增加,OFDI开始出现,但水平很低,NOI为负且绝对值不断增大;第三阶段,人均GNP处于2000~4750美元之间,IFDI增速开始明显小于OFDI增速,但IFDI仍大于OFDI,NOI为负且绝对值不断缩小;第四阶段,人均GNP处于2600~5600美元之间,NOI为正值且仍持续增长,这表明

要么IFDI小于OFDI,要么OFDI的速度快于IFDI。1996年,邓宁和Narula将投资发展周期由四个阶段发展到第五阶段,形成较为完整的五个阶段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第五阶段,一国的NOI绝对值相对于上一阶段已开始下降,并逐渐回归至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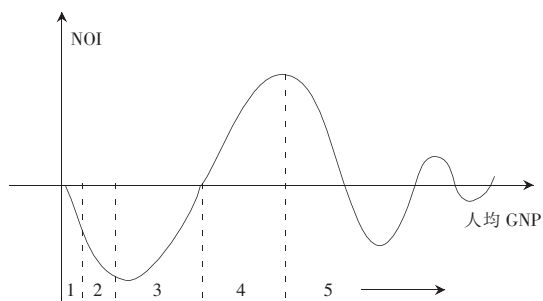


图1 投资发展周期的五个阶段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2]提出了竞争发展阶段理论,尽管该理论本意不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但由于它对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区位优势 and 所有权优势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完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波特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特征与竞争优势结合起来,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依次经历资源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四个阶段。在资源驱动阶段,该国拥有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国家拥有规模优势;而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往往拥有研究与开发方面的优势。竞争发展阶段理论说明了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和一国竞争力的关系。

在邓宁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之后,日本的经济学家小泽辉智(Ozawa, 1992)^[3]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尚处于劳动驱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动比较优势动态化,以及如何选择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当一国处于要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驱动阶段时,它吸引的一般都是属于资源导向型或劳动力导向型的FDI。当一国从劳动驱动阶段向投资驱动阶段过渡时,它主要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中吸收外资;与此同时,在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产业中会产生向低劳动成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当一国从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渡时,它将在技术密集产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在中间品产业中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在此发展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与经济结构变动相应的资本有序流动,不论是IFDI还是OFDI,每一个阶段都会与特定的FDI类型相匹配。与前三个不同阶段相对应的IFDI类型分别为要素寻求、市场寻求和市场/技术寻求,相对应的OFDI类型分别为支持性资源寻求、低成本劳动力寻求和市场/技术寻求。^[4]

从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IFDI要先于OFDI,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本要素的短缺,学习和接触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地区)先进技术、企业商誉、管理经验、企业文化等一揽子经营资源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随着资本、技术及管理能力和要素的积累和优势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市场容量都会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会随之增强,国家区位优势也会得到改善,这些最终会促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二)文献回顾

国内众多学者运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我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双向投资发展阶段进行了实证研究。马林平等(2001)、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彭凯、储小俊(2005)、邱立成、于李娜(2005)、涂万春、陈奉先(2006)、姚永华等(2006)、曹红玉(2009)、杨健全等(2006)、齐晓华(2004)、薛求知、朱吉庆(2007)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双向投资结构当前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

上述学者的研究中,但凡使用二次函数模型的学者都照搬原理论机械地采用人均GDP作为自变量。事实上,人均GDP要比人均GNP更为合适。因为在投资方评估我国国内消费水平及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能力时,大多考虑的是我国实际人均GDP而非按PPP折算的人均GNP或人均GDP。此外,实证研究的样本大部分采用2006年之前的数据,而最近几年我国双向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IFDI增长趋于稳定,而OFDI增幅则非常显著,这些研究对此现象并没有考虑。再则,较多学者选取我国人均NOI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NOI确实更能代表我国双向投资的整体变动,而判定我国双向投资的整体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正是本文分析的主要目的。因此,本文选用人均GDP为解释变量、全国NOI为被解释变量来建模,检验我国双向投资发展所处的阶段。

二、我国双向投资发展阶段实证检验

图2显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NOI和人均GDP变化的趋势。从此图中可以看出,1982~1992年我国NOI为负且其绝对值较小,这一阶段我国双向投资

处于 IDP 理论上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设施以及法律体系不完善,区位优势较弱,吸引外资有限,而本土企业由于所有权优势缺乏,对外投资较少。1992~2006 年我国 NOI 呈负数增长,双向投资处于 IDP 理论上的第二阶段。这是因为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国内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区位优势的增强吸引了外资流入,IFDI 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资金、成本和规模等多方面优势,我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有所增强,OFDI 进入快速扩张阶段。从 2007 年开始,我国的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大于对外投资,但是由于 OFDI 增速大于 IFDI 的速度,NOI 仍为负但其绝对值不断减少,双向投资已经进入 IDP 理论所描述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引资的目标和政策发生变化,导致 IFDI 增长趋于稳定;同时,综合国力的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政策促进了 OFDI 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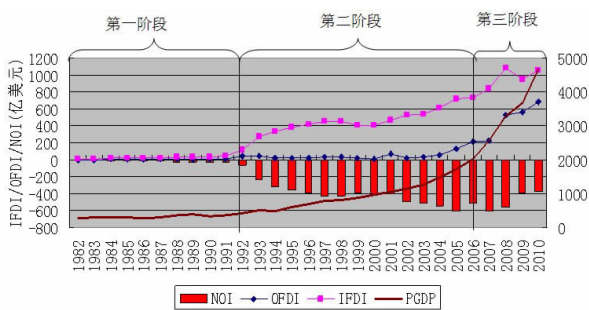


图2 1982年以来中国NOI和人均GDP变化的趋势图

为了更精确、深入地判定我国双向投资发展阶段,本文以邓宁 IDP 理论为依据,选取 1982~2010 年的统计数据检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双向投资之间的关系,明确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双向投资结构发展阶段是典型的 U 形曲线。根据计量理论,针对这种 U 形曲线,我们采用二次函数模型,并通过回归结果中的一次方项和二次方项的符号来加以判定。^[5]正如前文所述,我们选用更为现实和直接的实际人均 GDP 作为解释变量,选用全国 NOI 作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NOI=b_0 + b_1PGDP + b_2(PGDP)^2+U_t \quad (1)$$

其中 NOI 为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PGDP 为我国人均 GDP, U_t 为随即误差项。根据 IDP 理论和我国

实际情况,预期 b_1 为负, b_2 为正。运用 Eviews6.0 软件,拟合图 3 中数据得到如下结果:

$$NOI= 87.7795-0.5741PGDP+0.000108(PGDP)^2 \quad (2)$$

$$se = (37.9122) (0.0566) (1.29E-05)$$

$$t = (2.3153) (-10.1357) (8.3726)$$

$$P \text{ 值} = (0.0287) (0.0000) (0.0000)$$

$$R^2=0.8288 \quad \text{校正 } R^2=0.8156$$

$$F=62.9279 \quad P(F)=(0.0000)$$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该二次函数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了 0.82,模型校正后的拟合优度也接近 0.82;其次, b_2 为正, b_1 为负,与预期的结果一致;最后,模型的各项系数都通过了 t 检验,也就是说,该模型显示我国人均 GDP 及其变化值很好地解释了我国 NOI 的变化。

下面主要分析两个有研究意义的值:一个是被解释变量取最小值时解释变量的取值,即判断双向投资结构从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的界点;另一个是被解释变量取零值时解释变量的取值,即判断双向投资结构从第三阶段转入第四阶段的界点。也就是 NOI 最小时 PGDP 的值和 NOI 等于零时 PGDP 的值。

先确定第一个值,方程(2)右边对 PGDP 一阶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得:

$$0=-0.5741+0.000216PGDP \quad (3)$$

解方程(3),得 $PGDP=2657.87$,将其代入方程(2),得:

$$NOI=-675.162$$

由此可知,当 PGDP 为 2657.87 时,NOI 值最小,为 -675.162,这就是说当我国人均 GDP 达到 2657.87 美元时,我国 OFDI 与 IFDI 的差额为最大,即 675.162 亿美元。由 IDP 理论可知,在 $PGDP=2657.87$ 之前,随着我国 PGDP 的增加,IFDI 增幅大于 OFDI 增幅,|NOI| 不断增加;此后,随着我国 PGDP 的继续增加,OFDI 增幅超过 IFDI 增幅,|NOI| 开始不断减少。

再确定第二个值,令方程(2)左边为零,得:

$$0=87.7795-0.5741PGDP+0.000108(PGDP)^2 \quad (4)$$

解方程(4)得:

$$PGDP=5158.17$$

由此可知,当 PGDP 为 5158.17 时,NOI 值等于零,表明当我国人均 GDP 达到 5158.17 美元时,

OFDI 与 IFDI 规模相当,NOI 为零;当 $2657.87 \leq PGDP \leq 5158.17$ 时,随着我国 PGDP 的增加,IFDI 增幅低于 OFDI 增幅,但就规模来说前者仍大于后者,NOI 小于 0 但 INOI 不断减少;此后随着我国 PGDP 的继续增加,OFDI 规模超过 IFDI 规模,NOI 大于 0 且 INOI 不断增加。

结合我国双向投资发展实际来看,2006 年人均 GDP 为 2017.56 美元,NOI 为 -515.55 亿美元;2007 年人均 GDP 为 2567.6 美元,NOI 为 -610.52 亿美元。根据 IDP 理论和上述二次函数模型的结果可知,2006 年前我国双向投资处于 IDP 理论中所描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2006~2007 年正在经历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进入第三阶段。这一推断既与 IDP 理论中的经验数值大致符合,也与从图 2 中所得直观结论相一致。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双向投资结构已经进入 IDP 理论中所描述的第三阶段。

三、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一)重视 FDI 技术外溢效应

从微观层面上看,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产业时会对上下游关联企业产生技术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新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向本土上下游配套企业扩散。由于跨国公司在当地化生产中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示范,本土企业可以通过模仿改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本土企业通过“干中学”不断向外资企业学习,吸收掌握先进技术,学习工艺流程、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设计能力,实现自主创新。从宏观层面上看,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技术、企业商誉、管理经验、企业文化等一揽子经营资源,改变着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市场容量。¹⁶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增强和国家区位优势改善最终会促使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要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外资项目,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研发项目和研发项目来华投资;鼓励本土企业以合资形式、战略联盟、外包、合作生产等股权和非股权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以期获得外资

带来的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二)提高东道国吸收能力

技术外溢会引起东道国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如果东道国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的水平较低,那么东道国对所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效果也差,FDI 的溢出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政府应加大研发的投入,注重自身技术创新,特别是通过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建立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应重视高等教育,注重国际化、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政府要通过提供信息、资金援助以及提升技术等手段促进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联系,尤其是努力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前后向联系,促进内资企业与外资形成有机的配套。

(三)增强本土企业竞争优势

作为国际化经营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障碍是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比如研发能力、核心技术、知名品牌、管理与组织能力、营销网络等,所有权优势的不足加大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减少了海外投资的收益。因此,要培育大型企业集团,进行强强联合,实现资源重组和规模优势,以整体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培育技术和品牌,提高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树立品牌形象;重视企业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和运用,以满足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需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激发企业创造力,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区位优势

在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时,政府在国内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断升级中应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要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加强产权保护,减少企业运作障碍,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洁程度,加快市场培育,放松金融管制,提高企业投资自由度等,积极创造一个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企业同外资企业之间、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统一和完善双向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间的融通互补,探索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互动模式,如不断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并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整合利用投资与对外投资促进措施,在统一的投资促进制度框架

下开展双向投资工作;不断完善双向投资的管理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各部门统筹兼顾,双管齐下,从而真正将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均衡发展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 [1] Dunning, 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J], 1981, (117):30-64.
- [2]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 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45-46.
- [3] T.Ozaw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2,(4):74-78.
- [4] 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54-55.
- [5] 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8-80.
- [6] 李辉, 张荣.中国双向投资问题研究[J].*亚太经济*,2012, (5): 111-116.

(责任编辑:彭晶晶)

Study on China's Two-way Investment: Developing Stage and Countermeasures

LI Hui¹, XING Zhi-yi², LIU Xiao-min³

(1.Kingbridge Commercial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2.City Institut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600, China; 3. Kingbridge Commercial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Abstract: IFDI and OFDI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has brought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managerial resource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changing factor endowment, comparative advantage, economic structure, market capac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ownership advantages of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ocation advantages of the host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invest overseas. Based o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eory, using empirical tests, we conclude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third stage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erefore, ownership advantages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wo-way investment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Key words: two-way investment; IDP; economic development